

论敦煌石窟早期建筑与造像的艺术特色及其多元化内涵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Multiple Connotations of Early Architecture and Statues in Dunhuang Grottoes

赵子健

Zijian Zhao

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中国·香港 999077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摘要】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它是集建筑艺术、造像艺术及壁画艺术为一身的综合艺术体。敦煌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文章选取敦煌石窟早期建筑艺术和造像艺术为研究对象,描述其艺术特色,并试图从敦煌石窟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等因素出发探究敦煌石窟多元文化艺术之内涵,以求教于方家。

【Abstract】Grotto ar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tistic expressions in Buddhist art. It is a comprehensive art that integrates architectural art, statue art and mural art. Dunhuang Grottoes group is one of the four largest grottoes groups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the largest and most abundant grottoes group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early architectural art and statue art of the Dunhuang Grotto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describing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 art of the Dunhuang Grottoes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Dunhuang Grottoes.

【关键词】敦煌石窟;佛教艺术;建筑与造像

【Keywords】Dunhuang Grottoes; Buddhist art; architecture and statues

【DOI】10.36012/lcs.v2i1.1494

1 引言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它是集建筑艺术、造像艺术及壁画艺术为一身的综合艺术体。敦煌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据唐代《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可以判断出敦煌石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经历了一千多年,现存造像三千余身,是重要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内容之丰富、技术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举世罕见的^[1]。本文选取敦煌石窟早期建筑艺术和造像艺术为研究对象,描述其艺术特色,并试图从敦煌石窟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等因素出发探究敦煌石窟多元文化艺术之内涵,以求教于方家。

2 敦煌石窟的特殊地理环境与多元历史文化

石窟是在山崖之上开凿出的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早期佛教中,坐禅入定是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课之一,这也是离苦得

乐的必由之路。故而石窟的开凿需要远离城镇的喧闹,一般选择建在人迹罕至的清静之地,如此僧人们便可以专心礼佛而免受俗世的打扰。然而,石窟之所在也不能距城镇太过遥远,因为僧人们不仅要向俗世宣扬佛法,而且更离不开俗世的供养。所以这不仅要求石窟与城镇的距离适中,还要求石窟靠近交通要道,如此不仅方便僧人传播佛法,更方便于信众前往石窟参拜及供养。敦煌石窟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有着独特的地位。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两路:南路由凉州出关,经过敦煌,穿过沙漠到达鄯善,沿天山南路到达于阗,往西北进入莎车;北路从敦煌之北往西北方向进入伊吾,经库车焉耆进入龟兹,到达疏勒^[2]。由此可见,敦煌是中国与西域、西亚、北非及欧洲交流的咽喉要道。汉武帝建立了河西四郡之后,完成了西域地区的有效统治。经过汉武帝之后多年的发展,敦煌地区引进了先进的农业发展措施,很快发展成为经济重镇。加之敦煌地处偏僻的中国西北地区,远离中原,这很好地避免了诸如“八王之乱”之类的战争灾难。正如陈寅恪先生形容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迁徙之区……^[3]”

敦煌不仅保持了本地区的政治稳定,还不断地吸引了大规模的移民,在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为文化艺术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敦煌地区向西北是玉门关,向南则是阳关,成为各国客商、使团及僧人东来西去的必经之地。他们为敦煌带来了天竺文化、波斯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及中原文化等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及艺术风格。加之敦煌地区原有的匈奴、乌孙、月氏等游牧民族文化,敦煌地区成为多元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十字路口”^[4]。印度佛教的石窟艺术经中亚到西域,沿着丝绸之路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养分,在敦煌表现出了多元的文化特征,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敦煌特色的艺术风格。

东汉以后,战乱迭起,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此时的百姓长期生活在战乱之中,渴望脱离苦海,迫切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同时,统治者也需要新的思想武器巩固自身的政权。佛教顺应了社会需求,努力与本土儒家、道家融合,从而得到了更大规模的传播与发展。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河西地区的佛教发展迅速,尤其是敦煌地区。公元4世纪初,十六国时期的敦煌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很多文人学者和能工巧匠为了躲避战乱在敦煌地区定居,他们在传承汉晋传统文化的同时加以创新,形成了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这个时候的佛教重新释读教义,广泛宣传儒家倡导的忠孝观,已经成为河西地区重要的文化形态。敦煌石窟佛教艺术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中,借助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元文化发展起来的。

印度佛教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与优秀艺术风格融合,派生出了多种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佛教艺术流派。贵霜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与希腊雕塑艺术融合,形成了犍陀罗艺术风格。随着佛教的东传,犍陀罗艺术风格由大月氏人带到了西域。公元3世纪,位于昆仑山北麓的于阗,艺术家们将本土特色及中原艺术风格融合进了印度秣菟罗艺术风格和犍陀罗艺术风格,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于阗佛教艺术。于阗佛教艺术沿着丝绸之路北道传至西域大国——龟兹,并进一步融合龟兹传统形成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这对后来的敦煌石窟的建筑形制影响巨大。

总的来看,敦煌处于多元结构的文化场域之中,更容易吸纳异质文化融合进入母体文化结构并形成新的多元文化内涵。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传播和发展。

3 敦煌石窟早期建筑的艺术特色

敦煌石窟的早期一般是指前秦、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几

个历史时期。敦煌早期的石窟建筑形制是以印度传统建筑风格及西域建筑风格为主,夹杂着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融合体。这段时期的洞窟形制主要以中心塔柱式窟为主,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涅槃窟、大佛窟及毗克罗式窟(禅窟)。现在世界各国的学者基本上认为现存于莫高窟南区的第268、272、275窟开凿时间最早^[5]。学界认为这三个洞窟的开凿时间早于北凉时期,有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前秦时期,一般称之为“北凉三窟”(见图1)。北凉三窟处于莫高窟的中部且互为比邻,然而在建筑形制上又各不相同。第268窟是一个平顶小窟,平面作长方形,它由信道式主窟和两侧的两个附属洞窟组成。西壁正中开一尖眉圆券形浅龕,内塑交脚弥勒佛像一尊,坐于方形台基之上。这个洞窟形制大小很不规范,是属于探索阶段的模仿性洞窟。第272窟紧邻第268窟的北侧,窟平面为方形,窟顶近似穹窿样式。西壁开一圆拱形大龕,内塑结坐佛像一尊于方形台基之上。这种近似覆斗形洞窟明显受到中原传统殿堂形制的影响,也被称为殿堂式洞窟。第275窟处于第272窟的北侧,窟平面为长方形。窟顶呈纵向人字坡状,并浮塑有典型中原木质结构建筑特点的脊枋和椽子。正壁塑交脚弥勒菩萨一尊于方形台基之上,两侧各塑一狮。南北两壁上开并列对称阙形龕及圆拱形龕各四个,龕内分别塑有交脚弥勒菩萨或思维菩萨一尊。北凉三窟在建筑形制上主要继承了西域艺术风格,也表现出受中原艺术的影响之大。



图1 莫高窟第268、272、275窟(北凉三窟)

北魏时期的石窟建筑既保留了印度及西域艺术成分,同时也明显表现了中原艺术元素,形成了中西交融的多元艺术风格。前文提及龟兹石窟艺术对敦煌石窟的建筑形制影响巨大,印度支提窟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石窟形制,这种窟型传到龟兹后,经过本地艺术家的改造,变成了一种具有龟兹艺术特色的中心塔柱式石窟。这种窟型考虑到了龟兹的地质情况,在保留了拱形顶的基础上改造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拜殿,并用链接窟顶与地面的方柱替代了原始形制中的舍利塔。这种窟型参考了古时印度支提窟佛寺的凿窟形式的同时,又考虑到了龟兹地方松沙质结构不适宜营建高大洞窟,而创造的一种特有佛窟^[6]。敦煌石窟继承了龟兹石窟的简明完整,弃去了印度支提窟的一圈石柱。敦煌石窟中的中心塔柱式窟具有汉代木构多层方形塔的特点,窟顶与底部链接,故而称之为“中心塔柱式窟”。敦煌石窟的窟顶后部为平顶,前部为人字坡形,明显模

仿了中原建筑形制。

中心塔柱式窟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由人字坡形窟顶和南北壁前部及东壁构成,是一个供信徒礼拜佛像的空间。石窟后部是由平顶、中心塔柱、南北壁后部以及西壁构成的信道式空间,可供信徒绕行礼佛。中心塔柱的顶部与底部是和整个建筑连为一体的,柱身四面开龕塑像,面对东壁的一面开一大龕,其余三面开两层小龕。有些洞窟的南北两壁也有开龕。佛龕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尖眉圆券龕”,此类龕楣为火焰型,左右各立一柱承接楣脚,这种类型具有典型的西域艺术特色;另一种是“阙形龕”,龕楣是中原风格的屋檐,两侧立石柱支撑屋檐,佛龕内部呈方体,这种类型具有典型的中原艺术特色。中心塔柱式窟是北魏时期的代表,这种窟型在之后的西魏、北周以及隋唐时期慢慢减少,直至基本消失。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石窟建筑不同的样式,不仅以建筑语汇表述了佛教的发展进程,也表现了一种文化形态向另一种文化形态的转换^[7]。敦煌早期石窟建筑中也有三处毗克罗式窟(禅窟),这种窟型会在南北壁及西壁开凿三个一米见方的小洞窟,用于僧人打坐参禅。这种类型的石窟在印度石窟中很常见,属于完全的模仿。

第 285 窟(见图 2)是西魏时期建成的洞窟,这个石窟的形制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此窟分为前室和主室,主室为覆斗帐形。覆斗形顶由中心藻井和四面斜坡构成,仿若帝王华盖。有学者认为,石窟当中的前室可能来自中国汉代以来传统的崖墓形式^[8]。



图 2 莫高窟第 285 窟

敦煌早期石窟建筑表现了多元化的艺术风貌,形制上基本遵循对称、和谐、统一的审美原则,表现了整体洞窟的神秘与庄严。

4 敦煌石窟早期造像的艺术特色

敦煌石窟的造像几乎都是敷彩泥塑,最早可以追溯到北

凉时期。现存造像三千余身,其中三百多件属于敦煌石窟早期。敦煌石窟早期造像大体可分为圆雕和浮雕两种类型。圆雕是一种可供观者多方位欣赏的三维立体雕塑,但由于石窟造像艺术的独特性,造像需背靠龕壁,观者无法从四周欣赏。圆雕的主要题材是体积较大的佛、菩萨、天王等。浮雕是一种附属在一个平面的雕塑,属于一种附属性的影塑,主要用压缩的方式依靠透视等因素表现三维立体感。浮雕的主要题材包括飞天像、千佛像、伎乐天、供养人像以及饕餮、龙头等大量装饰图案。敦煌石窟早期造像主要体现了协调安定的艺术风格,很少表现动态的形象,营造了一种静谧的宗教氛围,这与俗世的嘈杂喧闹形成鲜明对比,给予观者来自佛教世界的无声抚慰。

敦煌石窟早期造像艺术风格有较为明显的西域特征,但相较于克孜尔和龟兹等地的造像也有一定的特色。服饰上,贴体薄衣、璎珞、项圈及臂钏等依然承袭印度秣菟罗艺术元素;面部表情上,虽然保留了高挺的鼻梁,然而在眉眼间的细微之处已经完全脱离外来模式;形体上,出现了双脚交叉的形象,这是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艺术化表达;雕刻材质上,敦煌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以泥塑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因此形成了多种新的创作方式。

从北凉三窟可以发现,北凉时期的造像内容主要是佛和菩萨,包括禅定像、思维像、说法像等。第 275 窟西壁主龕中的交脚弥勒菩萨像是现存敦煌石窟早期最大的弥勒塑像。弥勒菩萨头戴三圆环式宝冠,正面圆环中浮雕坐佛一尊。菩萨体型高大,比例匀称,面容敦厚,细眉大眼,鼻梁直挺,小嘴薄唇,脖颈粗壮。菩萨上身袒露,披肩绕肘部自然下垂,颈部配戴宝石项圈,胸前挂短款璎珞,手臂装饰臂钏,下身穿薄款贴身裙子。菩萨双手作说法状,足踏莲花,交脚端坐于方形台基之上。这尊菩萨像的服饰是典型的印度秣菟罗艺术风格,但是在眉骨、眼窝、眼睑等细节和体态上略带有中国化的艺术特点。

北魏和西魏时期的敦煌石窟造像艺术更进一步完成了与中原文化艺术的结合。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且崇佛重禅,中原地区的汉族服饰风靡北方地区,南朝秀骨清像的造像艺术风格也开始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主政敦煌期间(公元 535~556 年前后),敦煌石窟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蔚然成风。佛教造像面容上,瘦脸细颈,细眉小眼,薄唇小嘴,神情疏朗;身形上,清瘦苗条,比例匀称;服饰上,内衬交领襦,胸前束带,外披对襟式袈裟,表现出了褒衣博带的南朝艺术风格。这也逐渐成为当时社会主流的审美风尚。

这种瘦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造像风格,在西魏时期被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西魏时期的第 285 窟(见图 3),西壁开有一

大两小三个佛龕。中间大龕内塑有坐佛一尊,身着宽大通肩式袈裟,左右两侧小龕内塑有禅僧像,身着百衲衣,面貌清瘦,身体扁平。又如第 432 窟中心塔柱北向面的右侧胁侍菩萨(见图 4),神情疏朗,体形苗条,身着交叉天衣,束腰带,大冠高履,表现出典型的南朝士大夫的潇洒形象。



图 3 莫高窟第 285 窟 西壁南侧比丘禅定像



图 4 莫高窟 432 窟 中心塔柱北向面右胁侍菩萨

北魏和西魏时期的敦煌石窟造像艺术受中原艺术文化的影响巨大,在保留部分西域艺术元素的基础上大量使用中原特色,使之更加贴近世俗生活,表现出了多元的文化艺术风格。这一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在分别来自中原、西域和敦煌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下“文化大碰撞”,带来了艺术的伟大成就与急剧的变化^[9]。

北周时期,敦煌在令狐家族、韦氏家族等名门望族主政期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这也为敦煌石窟

造像艺术创造了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环境,造像艺术上融汇多元艺术风格的“敦煌风格”逐步形成。

北周时期的第 438 窟(见图 5),西壁龕中塑有坐佛一尊,脸型饱满,身着土红色袈裟,袈裟纹路的雕刻手法显示出“曹衣出水”的风格,表现出自然下垂的薄纱质感。



图 5 莫高窟第 438 窟 西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造像大多长方脸型,面容饱满,神气减少而人气增加,贴近世俗百姓相貌。体型上,身形矮壮,头较长而腿略短,已经初步显露出隋唐时期的造像风格。

5 结语

总之,敦煌石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为印度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艺术场域。同时,敦煌石窟早期的建筑艺术和造像艺术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水平及文化程度密不可分。安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是文化艺术兴盛的坚实基石。敦煌早期石窟建筑及造像艺术融合了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并逐步形成了更具中原特色的敦煌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 [1]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J].敦煌研究,1995(2):3-7.
- [2]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卷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4]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 [5]赖永海,王月清.中国佛教艺术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6]李遇春.试论敦煌石窟艺术和新疆石窟艺术的历史关系[C]//林保,关友惠.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艺术卷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70.
- [7]娄婕.试论敦煌石窟艺术的空间构成[J].敦煌研究,1999(4):173.
- [8]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
- [9]郑炳林,沙武田.敦煌石窟艺术概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